

《历史的天空》三部曲之一

土崩

蔡行来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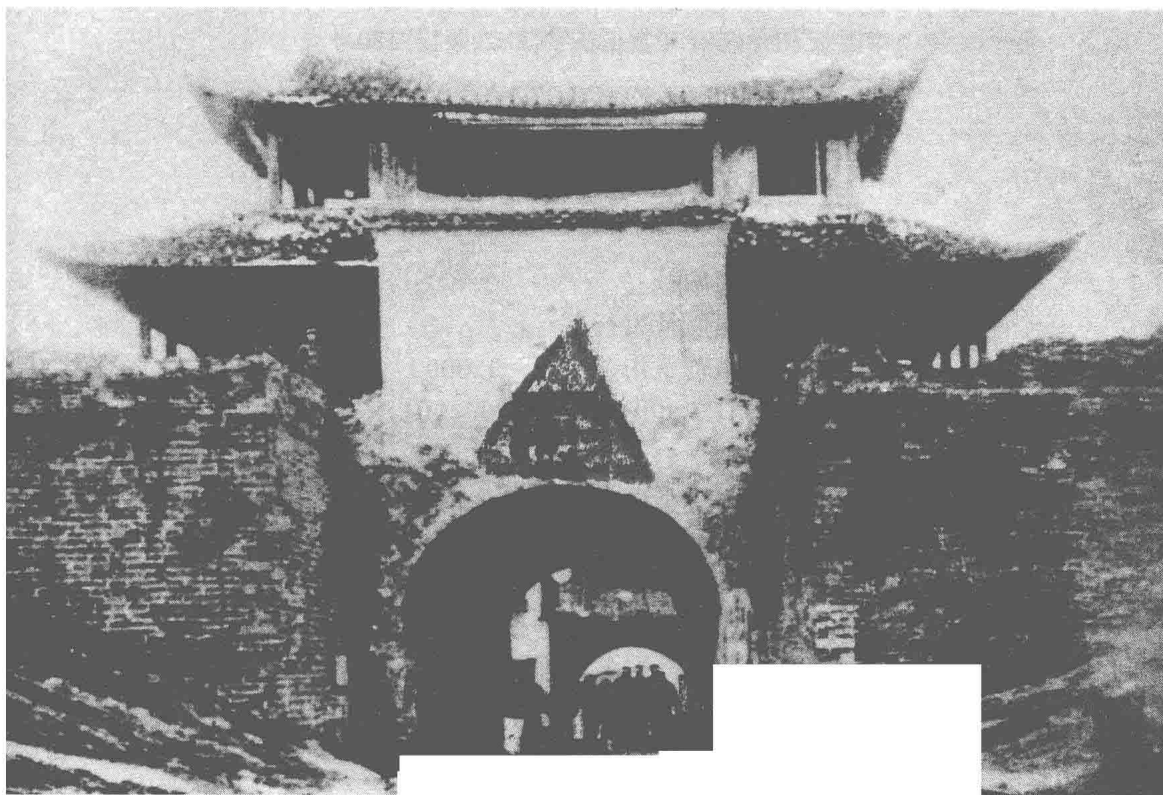


黄河出版社

《历史的天空》三部曲之一

土崩

蔡行来 著



责任编辑◎左世明

封面设计◎蔡行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的天空——土崩/蔡行来著. — 济南:黄河出版社,
2015.6

ISBN 978-7-5460-0711-3

I. ①历… II. ①蔡… III. ①回忆录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42180号

书 名	历史的天空——土崩
著 者	蔡行来
出 版	黄河出版社
发 行	黄河出版社发行部
社 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91号 250002
发 行 部	(0531) 82058193 82904901
编辑电话	(0531) 51687302
印 刷	成都市天金浩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700×1000(毫米) 1/16 12印张 260千字
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0-0711-3
印 数	1-1000册
定 价	29.00元

王献辰是1948—1949年我在临海建成中学读书时的同班同学，白水洋镇蒋岙村人。我们也是同乡，较为亲近。解放后他在小学教书，后来被清退回家。回家后因家庭成分是地主，生产队不准其外出再找工作；找到工作后也不给开证明，单位不敢录用，待在家多年。但他很聪明，非但写得一手好字（80年代在台州中学看大门时兼刻钢版蜡纸字），且会篆刻。私刻了生产队公章，制作了准予其外出工作的证明函，并在外找到了工作。1957年，他被生产队发现后追回。后来以私刻公章罪被逮捕，临海县法院判他有期徒刑七年。他告诉我是俞克雄副院长判的。私刻公章伪造文书对社会带来的危害显而易见，我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也有明文规定，要受刑事处罚。因此，不能说这个判决是轻还是重。但能说明那时对私刻公章、伪造文书是要严厉打击的。也说明那时社会上这类犯罪较为罕见，否则，监狱必人满为患。

但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私刻公章变成了一种职业。大街小巷常贴着招揽私刻公章、伪造文书等的小广告，并写明了联系电话。长期以来，非但屡禁不止，且愈演愈烈，致使环卫部门专门设有清理这些小广告的人员编制。连我们小小的临海县级市也有清理这些“膏药”的专职人员，我还同其谈过话。她说：“临海市环卫站专门从事清理小广告的有20来人，每天工作量很大，穿梭在大街小巷间。还为此工种特制了铁和竹的刮刀，并备有多种色彩的外墙涂料用于涂盖。工作时必有损伤外墙与门窗，常与住家发生摩擦、争吵，所以环卫站领导要我们2人一组，以应对可能发生的争执。”我在其他城市也见到不少此类人员，设备最好、效率最高的是上海火车新客站（闸北）附近，我见到清理工操纵一台水枪，水到纸飞，干干净净，技术先进，无与

伦比，可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也说明这个行业利润丰厚、兴旺发达。不过未听到现今对私刻公章伪造文书者有像对王献辰那样的严厉惩罚。

但也见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最近我偶然发现我处临海新江路169号住家门口的“介绍对象”广告上，其上端写有两条私刻公章办证的小广告，分别是“15002363839 办证”和“18711872641 办证”（见照片）。因小广告写在布制的“介绍对象”大广告上，用刮刀刮不了；又在人家家门口自家广告上，不容你用涂料涂盖，因而得以长时间保留。



办假证小广告
写在大广告上（局部）



小广告写在
“介绍对象”广告上（全貌）

而前几天我在该处左侧铝制广告牌上看到张贴的办证小广告已被清除。

张贴广告招揽办假证生意还较隐晦。1999年10月24日，我在武汉洪山广场农贸集市中看到公开设有私刻公章、办理假证的摊点。各种假证应有尽有，且明码标价：大学毕业文凭××元、高中毕业文凭……旁边还有警察在场。我问一位当地人：“警察管不管？”他说：“有人举报，警察也来管一下，所谓管也只不过移移一下位置而已。”之后我在其他城市也陆续见有此类摊点。

因工作需要，我要与人打交道，发出不少名片；我写的书上还写有我的手机号和家里的传真号。当初我认为可以此增进联系、扩展业务，现却是“后患无穷”。我手机上常收到虚假欺诈电话或短信，如限时到法院领取判决书、到邮政领挂件、假烟批发，甚至有枪支弹药买卖，等等。有时一天竟有几十条。我工作较忙，常不理它。但有人真正有事给我发来短信，我也不打开看，因此多次造成了误会和损失。更烦恼的是常在半夜三更接到电话，初始我以为亲人好友有急事，接了几回，但常是广告宣传或要我发给传真接收信号，大大影响了我的休息。之后我凡半夜打来电话都不接，也常在夜里关

机（坐机断线）。但次日多次忘了开机（接线），也担心亲人好友真有急事联系不上我。我不知如何处理为好，长期为此左右为难，特向临海市政府信访局反映，希望政府加强社会管理，制止这种干扰行为。信访局接待人员要我向公安局反映。公安局回答说这是全国性的问题，他们管不了，也无警力管。

报纸、电视、互联网上还常见到制假、欺诈的报道。如不久前广东揭发出医院开具假出生证，大大干扰了打击拐卖婴儿工作；用伪造的工作证购买优惠或免费的火车票；《京华时报》2015年3月30日刊登售假茅台酒的消息，此前《宁波晚报》也有此类事的报道。2015年4月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播放出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在会上严厉批评上报的环保检测资料中有作假。电视画面上还放出某单位把排放污染物实测记录468毫米，却在上报时改写为200毫米；把另一处不同时间多次的检测数都写为200毫米，因200毫米是合格的。这位副部长还说投资100亿建立起来的环保检测站作用不大。随后还对河北省辛集等5个县市就环保检测弄虚作假作了报道。4月2日，中央新闻台又报道了内蒙古国土资源厅《凭假资料发了真证件，2900万吨铁矿证件齐全却无矿可采》的新闻。资料中的13个钻孔根本不存在，其地质资料和环保评估等都是伪造，却层层审查过关，最后还通过矿产资源委员会的评审，内蒙古国土资源厅发了采矿许可证。

教育部门是社会文明之师，是培养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摇篮，现也每况愈下。多年来高考中出现了“替考族”，且屡禁不止。2015年6月29日，中央电视台新闻台播出我国目前高校中出现了“替课族”，不来上课的大学生为点到（避免旷课受罚），请人代为上课，每节课一般25元，教师也不管不问。这种替课者有的学校达10%左右。我在20世纪50、60年在大学就读书和任教时，一个班级30多个学生，有团员、党员，还有政治辅导员，彼此都一目了然，替课者怎么能“生存”？我任教时，上几个星期课后，要提问、要辅导、要考核，这30多个学生也都会认识、熟悉起来，现在高校中团员、党员远比那时多，这种现象的出现且兴旺发达真使人难以理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小学、初中实行九年制的义务教育，学费国家承担，也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照理来讲百姓应拍手称快。但我们临海一般群众为子女上小学、初中的费用发愁，有的还叫苦连天，这确又是难以理解。

临海市（可能本省、全国也差不多）好的国家办的小学，如哲商小学、中山小学，除本校原有不收费的公办小学外，现还办了民办小学，称为“国

有民办”，要收学费的。因任课教师原是在该校任教的，享受国家正式教师的优厚待遇，不愿脱离去民办学校工作，怕失去公办教师身份，现要在收费的民办学校任课，只有保留公职才能干，故叫“国有民办”。多年前我有一个亲戚的小孩被称为“中山实验小学”的国有民办学校就读，每学期要付学费5000元。我对该亲戚说：“读书主要靠自己的努力、天资，小学主要又不是学问，课本都是统一的，与学校关系不大，去公办的中山小学读是一样的，这个钱可省。”他说：“你不知道，不少想进‘中山实验小学’的还进不去，我还是有熟人在那边才进去的，有些人为了能进去读还花费用‘疏通’，他们那边教师好，负责，管理严。”今年我一姓金的邻居的女儿夫妻俩在济南工作，老家在临海乡下爱国乡，小孩已8岁，要上小学，也买到中山实验小学读书，学费每学期涨到6000元，夫妻俩辞了在济南的工作，回临海再找，加上租房子，他说到小孩小学毕业起码要花10万元。我说那回老家小学读不好吗？他说老家小学老师不用心，小孩“游了”，书读不好。此类话我也曾听多人讲过，公办小学、初中教师不认真，自修不监督，甚至打架也没人管。

临海市也有几所国有民办初中，不久前我认识一个老家在乡下更楼的姓孙熟人，在临海城关做临时工，小孩子今年在当地更楼小学毕业，成绩在班上较好，升初中考试215分（满分240），要到国有民办的临海外国语学校读（初中）（隶属以回浦中学为主体的回浦教育集团），学费每学期8400元，再加上在校外租房、家长来照料生活等，三年也要花10万元左右。我说更楼当地也有初中，何必来临海城关读？他说：“我儿子若在更楼中学续，那就‘完蛋’了，以后升学无望。”这些学费的收取，部分上交市政府，因此，这也是政府行为。“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有谁不希望自己子女、孙辈有高学历、好工作？但一般的家庭，哪有这么多的10万？政府向钱看，百姓也必向钱看，诚信、公平观会必淡漠了。“校门八字开，无钱莫进来。”变成当今活生生的现实。

我家远房侄儿蔡礼尚，是临海市农业机械公司职工，入赘在邻村爱人家。其爱人原是双港小学教师，因他们已生育有一个女儿，之后其爱人又育有一男孩，教育部门领导说她违犯《计划生育条例》，清除出教师队伍，失去公职。他们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在杭州办了电脑软件公司，收入颇丰。不久前我听说也是中国籍的蔡礼尚的儿媳从杭州去美国生小孩，按美国法律她小孩生下后便拥有美国国籍，做美国人，享受美国公民待遇。2015年7月20日，我在街上碰到蔡礼尚夫妻俩，我问他们是否孙子生在美国？蔡礼尚说是的，一

男一女两个都生在美国。我问他为什么要去美国生小孩？他说美国小孩读书便宜，洛杉矶买房也不贵。

社会道德坏了，诚信缺失，矛盾横生，必反映到上层建筑，也波及到司法机关。据说临海市法院民庭一位法官每年要办 200 来个案件。我有个案件 2011 年 12 月 7 日受理立案，其编号为（2011）台临民初字第 3415 号。这对仅 10 多个法官的临海市法院民庭来讲，此时差不多当年每位法官要承办 200 个案了。法官办理一个案件起码要看起诉书，要开庭，要写判决（裁定）书，一年仅约 240 多个工作日，大概 1.2 个工作日要办一个案件，真不堪重负，质量怎能保证？我 1980 年有个民事案〔（80）临法民字第 20 号〕，是 1980 年 6 月 28 日判的。据说那时临海县法院每年也只不过办理 100 来个案件，在办理过程中也较认真。该案经办法官俞克雄多次下乡、上山去调查。不久前我有事找临海法院阎副院长，他对我说：现在法官不外出调查。这显然与《民事诉讼法》规定不相符，原因是太忙。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引领作用，司法草率、不公，必会引起恶性循环。

法院判决了，自觉执行的也不多。临海市法院执行局一位法官同我说，自觉执行的 50% 也不到。我有个案件，判决了对方不执行。我于 2014 年 10 月 26 日向临海市法院申请执行，法院受理后编号为（2014）台临执民字第 2837 号。可见执行局也不堪重负。

社会道德败坏，百姓素质不高，法官的素质也高不了多少。仅我所知，最高法院副院长、浙江省高级法院副庭长、台州中级法院庭、民庭法官、临海市法院院长都因犯法被判了刑。其中浙江省高级法院立案庭副庭长潘华山还是我（2008）浙民申字第 1029 号案的审判长。他收受了潮州市一诉讼人 5 万元贿赂。为怕暴露，设家宴招待行贿人，趁机不备，用锤子击其后脑致死，而后抛尸旷野。发现后，经审理判为死刑。我在本书中介绍的有个案件，经办法官写笔录时当我的面公然弄虚作假。美国立国 200 多年来只有 80 多个法官犯案，新加坡 1965 年独立以来，没有一个法官犯案。这对于我们一切权力属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一大鞭策。

据报道，资本主义制度的芬兰，三十年来法院只办理了一件受贿案，这似乎让人有些难以置信。但我国唐朝曾出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贞观之治，我想确有其事。如都是真的，我们的社会治安为什么不如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社会呢？但这些毕竟是遥远的或是历史上的事，我常要坐的公共汽车，过去听到的车上广播是：“请给老人让个坐！”现在我们小小的县级市临

海，公交车上近一年来每天反复播放“如何紧急逃生”，并用视屏演示逃生方法。不广播也摆，一广播更加人人自危。如真的遇此情况，已80多岁的我只能“视死如归”了。

这一切都说明我国的社会已呈现道德崩溃、诚信缺失，矛盾横生，犯法率增加，国家整体素质下降的局面。

日本侵略我国之前，对我国国情作了多方面的调查，认为中国人一盘散沙，私利重，难以凝聚，战必败。当时我国领导人也有此顾虑，故步步退让，用消极拖延应对，以便积聚力量再来抗击。虽然最后是我国取得了胜利，但这种胜利离不开国际反法西斯的共同努力，如果没有美国对日本的致命打击，仅我们自己，结果如何还真难以预料。我们现在社会的道德意识、公民素质，不如建国初期几乎是人们的共识；不少人还认为，建国初不如建国前。至少建国前街头张贴的办假证小广告没有现在这么多；住房安装防盗窗的也没有现在这么多。因此，不重建我国固有道德，如有不测，后果不可想象。

当今我国社会贪污受贿严重，欺诈成风，假货充斥，嫖娼泛滥，弄虚作假比比皆是，且长期来得不到有效治理、遏制，是道德败落的必然反应。若要改善应从源头上探讨、解决。

导致今日社会这些乱象，与建国后一系列政治运动，即与毛泽东反复讲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分不开。搞阶级斗争，在百姓中树立敌我，为争权夺利斗倒异己，不惜手段，弄虚作假，颠倒是非，后果之坏不可言喻。当权者哪能做到并教育百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国人素质必下降。道德必败落，犯罪必增加。

现虽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但过去的后遗症正在显现出来。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高举“三面红旗”，饿死几千万人。当时对这种违反自然规律的倒行逆施行为不少人提出异议。如为夺粮食高产，不是比喻急于求成适得其反的“揠苗助长”，而是把即要出穗的几十亩秧苗拔出移栽到一亩左右的田里，名曰放“卫星”，实际上是破坏生产，导致颗粒无收，但还要打肿脸充胖子，上报说亩产几万斤，广西环江县靠弄虚作假竟放出亩产13万多斤（130434斤）的“卫星”，并在全国竞相报道。对这种弄虚作假提出异议、反对的，以反革命罪遭到“死、关、管”处理。连写信反映都不敢署名，如查明后要以写匿名姓罪被判刑。而导致饿死人几千万的“三面红旗”万岁，却一直喊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当权者如此，百姓、下级官员怎会不去弄虚作假？

祸国殃民、文物遭到严重破坏、被称为“浩劫”的“文革”又要老百姓喊“万岁”，且一直“万岁”了10年。打着“反修防修”“江山不变色”这些堂而皇之的口号，实则为自己的权欲和私利，犯了错误怕被靠边、怕被打倒，先下手为强。这些不惜民间痛苦和国家损失的罪恶行为还要人们去歌颂去崇拜。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我单位旁侧浙江冶金学校一位教师不满当时无法无天的动乱，但怕暴露用左手反写了一封匿名信给中央，请予制止。后来被查出判了15年徒刑。我还亲临参加这次批斗宣判大会。我在南京大学的同学、单位同事朱健只因其祖父为前浙江省都督有较多的产业继承，斗得被迫自杀。1970年，我们地质队去温州永嘉县考察，住在当时还未复课的一所农村中学里，学校被武斗搞得满目疮痍，打破、砸滥的仪器设备集中在一教室，惨景难以入目。据报道，“文革”期间曲阜孔庙文物破坏了2/3。此类事全国到处比比皆是。如果真的“万岁”，中华民族五千灿烂的文化、珍贵的文物必然荡然无存。

在这种高压政治下，一切教育、文学艺术都要为政治服务，也可以说都要跟着弄虚作假，能弄虚作假就受到青睐。《高玉宝》一书便是一例。书中反角地主周扒皮，为了催促长工们早去干活，半夜三更偷偷摸摸地趴到鸡笼里学雄鸡打鸣，引起雄鸡们纷纷啼叫。鸡一叫，长工们不得不提早起床，下田干活。后来，长工们设计，故意把周扒皮当作“偷鸡贼”痛打了一顿。但根据动物生理学研究，雄鸡打鸣必须有自然光感刺激，半夜三更哪有自然光？何来打鸣？这一故事虚构得太离谱，明显是出于时代政治的需要，不惜弄虚作假，还不遗余力地宣扬。该书1955年出版后，一版再版，共印行500多万册，国内用7种民族文字印行，并翻译成近20种外文印行，仅汉文版累计发行450万册，成为解放后文学作品发行量之最；还编入了教科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现不谈周扒皮的真实为人，就是雄鸡不会半夜啼鸣的“半夜鸡叫”，当人们发现实际上没有这一回事的时候，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极坏极坏。

建国初至改革开放前的近30年间一直宣扬的四川大邑大地主刘文彩，是地主阶级罪恶的典型。1958年，大邑县根据四川省文化局指示在他住地建立了“地主庄园陈列馆”。1962年，人们在“三面红旗”下挨饿怨声载道时，毛泽东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来压阵，全国又掀起了抓阶级斗争的热潮，馆内先制作了用石膏做成的数十台布景箱，名曰“百罪图”——“高租重压”“吊打农民”“割耳”“强奸”“杀人”等100种罪行；

后来又制作了木桩搭身、蜡制头像、手脚、穿真人衣服的模型。为了更深刻地表现刘文彩的残暴，在陈列馆存放大烟的地下室设计了水牢、铁囚笼、三角钉刑具，复制了血水、血手印等。在相距“水牢”几步远的地方，又安排了一坐“地牢”。在这些展景前，参观的人常常是哭声一片。各种新闻报道及报告文学《从水牢中活下的人》轰动全国，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制了大型纪录片，戏剧《水牢仇》《水牢记》纷纷上演，刘文彩还上了小学课本。1965年夏，还创作了再经扩充、提升的泥塑《收租院》，并于国庆节展出，12月起还在北京展出，1968年赴阿尔巴尼亚展出，其后又在越南、日本、加拿大等国展出。1972年，又增添了多个罪恶项目，对《收租院》的宣传又进入了“新的层次”。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权威媒体连篇累牍竞相报道；大型纪录片《收租院》全国放映；人民美术出版社将《收租院》照片、画册、连环画分别发行全国，外文出版社用多国文字出版，介绍到世界各国。与此同时，上海、杭州、广州、南京、武汉、沈阳、西安、汉中、重庆、成都等地也大量复制了《收租院》泥塑群像展出。

改革开放后，随着大量冤假错案的平反和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文革”中由“地主庄园陈列馆”改名“四川省大邑阶级教育展览馆”的刘文彩庄园，日渐冷落，门可罗雀。影视界看到它的价值，在此拍摄了不少影片。随后当局认为有开发价值，请来了20多位文史哲学界专家学者来此考察、“会诊”。专家们作出“这座庄园保存得完好和完整程度是全国少有的，作为历史性的文博单位，治史要严，切忌虚构假设”的结论，刘文彩真相才大白于天下。所谓“水牢”“行刑室”等原来就根本不存在。1987年，陈列馆向上级递交了要求去掉“水牢”和“行刑室”的报告。现“水牢”改为“鸦片烟库”，“行刑室改为“年货室”。刘文彩兴办社会公益，出资200万美元在当地办了文彩中学的事也公之于众。

以上两例还是在特定条件下加以纠正。他们除了国内外闻名外，《半夜鸡叫》的还原则是由于周扒皮的玄外甥孙孟令骞的不断考证，刘文彩因有今日可利用的雕梁画栋庄园保留。至于一般的中、小地主只能永远甘当罪大恶极的阶级敌人了。

无中生有、弄虚作假、加罪于人远不止这些。众所周知的1957年响应党的“整风”号召向党提意见被扣上反党、违反宪法罪名的55万多右派分子、“大跃进”时为民请命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和里通外国的彭德怀、“文革”时对扭转三年困难有功却被扣上叛徒、内奸、工贼的刘少奇等的平反，说明他

们都是谎言下的牺牲品。

曾是毛泽东亲密战友的林彪说过：“不讲假话办不了大事。”这也许是他的肺腑之言，也是他的切身体会。我可谓是经历了建国后所有的政治运动，我认为：在改革开放前，不讲假话非但办不了事，且无立身之地。反右派时，即使你没有右派言论，如果你说反错了，那你就是右派。中国科学院的许良英、我在浙江大学的同事黄樾便是。1958年，“大跃进”中谁有抵触就要当作“白旗”拔，要受处分。三年困难时期，即使肚皮挨饿还要讲“‘三面红旗’万岁”，若有不满即要遭殃，我县右派分子施士元1962年上书中央反映民情，只不过言词稍显偏激，查出后遭枪决（现平反）。“文革”中武斗不止让生产停顿，还要我们讲形势大好。否则轻则挨批，重则以反革命罪坐牢、枪决，这些例子太多了，张志新便是其中之一。

迫使我们讲假话的另一重要形式是改革开放前的“政治时事学习”制度。我自1951年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及逝世后1~2年，虽变换了多个单位，军队、学校、生产部门都待过，都经历了“政治时事学习”这一制度。一般每星期除了白天上班（上课）时间有一两次半天学习外，还要在夜里安排两三个晚上（业余）学习。政治运动时更多。学习的内容除了有关上级下达的文件或指定的题目外，大都是当时的政治时事，故常常是报纸开道，再围绕报纸内容进行讨论，当然大家一般都按报纸的腔调发言。设这个制度的目的就是要将我们的思想纳入国家政策的轨道，统一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因此毛泽东有错我们也跟着错，这是平安大道。否则就可能挨批、挨斗、坐牢，因此不得不学会讲假话。特别是称为“引蛇出洞”的1957年反右派运动后，人人自危，不敢讲真话。我们这些没受处分、没扣上帽子的人为保平安几乎都是跟着讲假话过来的。这是我亲身的经历，我也跟着讲了不少违心的假话。因此以往的“政治时事学习”在培育讲假话的人才方面功不可没。不过我有时也还想留点良知，唱了反调，结果遭批判、批评，这在我日记和其他著作中有所提及。1978年后，随着“右派”平反、“四类”分子摘帽，这种“政治时事学习”也随之消失。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还常举办各种带有强制性的“学习班”，特别在政治运动中更加频繁，目的是整束异己，要与当权者观点保持一致，当然学习时不得不讲假话，否则过不了关。如1950年，我在回浦中学读书时的暑假，我目睹了教育局在我校举办小学教师思想改造学习班，用于交代问题、改造思想。农村集体化时，不愿入社的单干户学习班，宣传合作化优越性，要你入

社。粮食统购统销时，抗拒卖粮的钉子户学习班，要你把粮食卖给国家。上山下乡受阻的绊脚石学习班……花样繁多，形式各异。特别是“文革”中，这种学习班遍地开花，因主要对象是“五类分子”、走资派、阶级异己、臭老九等牛鬼蛇神，又称“牛棚”。半天学习，学那些“形势大好”“取得伟大胜利”等的假话；半天劳动或批斗。假话学到“脱胎换骨”改造好后才可“结业”出棚。出棚时还要用假话表态一番，假话讲得好的可提早出棚，名曰“解放”。我单位牛棚中有位陆×，他只不过年纪偏大一些，平时不大讲话，作为历史反革命、潜伏的特务分子关进牛棚，其实他什么问题也没有。也许他假话讲得好一些，是“解放”得较早的牛鬼蛇神之一。在“解放”他的大会上，革委会领导讲话后，陆×要上台表态。他刚站起离开座位时，即大声高呼：“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他坐在我后侧，弄得我莫名其妙，待他走向主席台，才知是他喊的口号。他在批斗会上被打过，劳动了几个月，本是一位普通职工，什么问题也没有，牛棚也枉关，现倒感激不尽。我当时就想：他高喊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真的是肺腑之言吗？

报告会、宣讲团在无中生有、弄虚作假上更功不可没。上述提到高玉宝写的《半夜鸡叫》，不说后来周扒皮玄外甥孟令骞的多方调查考证，半夜不可能鸡叫。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常识推论，周扒皮也不会半夜点灯钻到鸡窝里装鸡叫引起公鸡打鸣。引起公鸡打鸣，不去鸡窝也可，五更时间，邻居家公鸡打鸣，就会引起自家公鸡打鸣，周扒皮没有必要钻进鸡窝学鸡打鸣，何况即使把长工半夜弄醒赶到田野，田野还是黑乎乎的伸手不见五指，长工怎么干活？此谎言很易揭穿。但为了政治上的需要，高玉宝编造出半夜鸡叫的故事写成书外，还四处作报告，宣讲他的半夜鸡叫来丑化地主。前后作报告共约有4000场，听众5000多万人次。高玉宝也青云直上，保送他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深造，师职创作员，辽宁省民间文学会理事，沈阳军区创作室名誉主任，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中德友好协会理事，他被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数百个单位聘为名誉主任、顾问、德育教授、校外辅导员、中国少年儿童校外先进工作者、全国关心下一代名誉主任等。善于讲假话的人关心下一代干什么？

假话是如何讲起来，如何变为“真理”？现摘抄忆中思作的《坐过大地主刘文彩水牢的冷月英真相》一文如下：

据说早在1951年的一次会议上，“爱国模范”冷月英就提出了水牢说：

“1943年，我因欠了地主刘伯华（刘文彩的侄子）五斗租谷，刚生孩子三天，就蒙上眼睛抛进了刘家水牢关了七天七夜……”在此，冷月英并没有明确认定她坐的一定是刘文彩家的水牢。然而，冷月英的经历让上级主管部门深受启发，遂于1954年移花接木设计了“冷月英坐刘文彩家水牢”的方案。刘文彩水牢对于当地人而言是闻所未闻，引起了极大轰动。

根据上报大邑县委的《农业合作化展览总结》一文，设计这个方案的目的是通过冷月英“解放”前后的鲜明对比，“以达到‘想过去，看现在’的目的”。毫无疑问，这个目的达到了，由于在“典型事件的塑造及环境的布置上，都十分注重典型化，幕布、耳幕等均系用黑色，每景的图片也都刻画得很惨”，所以每个观众都能“触景生情”，“每天都有好多人情不自禁地流下了伤心的眼泪，甚至有引起回忆自己或自己爹妈解放前受地主压迫的苦痛而痛哭流涕，泣不成声的。”

刘文彩水牢就这样横空出世。不过，因为当时的政治大气候尚称平和，刘文彩水牢还只是轰动一个小小的大邑，没有引出更大波澜。1958年，阶级斗争升温，庄园陈列馆建馆，主管部门便全盘照搬1954年制作的刘文彩水牢模型，并给本来空空如也的地下室灌上水，仿制了铁囚笼、三角钉等刑具，以及血水、血手印，然后向社会开放，以它无声的恐怖接待来自四面八方的观众。

冷月英也开始由爱国劳动模范一变而为“阶级斗争活教材”，到处声讨刘文彩的滔天罪行，其演讲稿则完全由主管部门提供。“党叫干啥就干啥”的冷月英此时大概已是身不由己，讲台上的她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演员，演讲稿虽然不是出自她的笔下，她却不但可以倒背如流，而且演讲时能马上进入角色，简直是字字血，声声泪。她在台上边讲边哭，哭得像个泪人儿，而台下的听众也随之泪流不止。

通过冷月英“活灵活现”的演讲，人们知道：“在刘文彩的佛堂侧近一个角落里，秘密修建了水牢。据说，修建水牢的工人在完工后全部被杀害了。究竟水牢里害死了多少人，很难估计……这个人间地狱里灌满了水，尸骨堆积，冰冷刺骨。腥臭难当。牢里还有一个囚人的铁笼，上下四周密布铁刺和三角钉，被关进去站不能站，坐不能坐，真休想活命。”而冷月英是侥幸从水牢里活着出来的仅有的一个人……

有意思的是，冷月英演讲的水牢故事，有多种版本。在不同的版本中，情节各有不同。一会儿她说自己是1943年被关进刘文彩水牢的，一会儿说她

早在1937年就被关进了刘文彩水牢；一会儿说她是刘伯华的佃户，一会儿说她是刘文彩的佃户；一会儿说坐水牢期间她没有见过刘文彩本人，一会儿说坐水牢期间刘文彩提审过她。可惜，缺乏比较的听众们根本不知道不同版本之间的区别。

血淋淋的水牢和冷月英悲切的控诉，让听众们感同身受，特别是那些“一颗红心向着党”的笔杆子们纷纷从成都、重庆、北京等地来到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来切实体会水牢。1962年，作家李累、之光撰写的“纪实文学”《从水牢里活下来的人》在中国最权威的文学杂志《人民文学》上发表，举国震惊。

水牢和冷月英从此走出四川，成为了全国人民关注的热门话题。一大批以水牢和冷月英为素材的文艺作品相继问世。同年，戏剧《水牢记》《水牢仇》相继公演。而关于水牢和冷月英的新闻报道、宣传画、连环画更是不计其数，后来水牢还写进了中小学教科书，成为了刘文彩抹不去的“罪恶”。

而水牢的主角冷月英“红”透全国，其身份也随之发生了变化。1964年，庄园陈列馆改馆之前，冷月英任唐场蔬菜农场场长兼党支部书记；改馆之后，她被提拔为唐场公社党委副书记，并办理了“农转非”手续，从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变成了国家干部。不过，她最为重要的工作就是充当“阶级斗争活教材”。而“文革”十年，是她演讲最为忙碌的时期。据说她在全国各地演讲了一千多场，听众上百万。

“文革”结束后，中国由“阶级斗争为纲”转到“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阶级斗争活教材”的“冷妈妈”，也就永远地失去了利用价值。虽然她仍担任大邑县政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但实际上无事可干。于是便主动申请退休。1981年9月15日，冷月英正式隐退。同年，在接受陈列馆人员调查时称，“是县委要我那样讲的”。3年后，她在落寞和困惑中去世，时年73岁。

此时，喧嚣一时的刘文彩水牢真相也由于知情人的披露、陈列馆的进一步调查而开始闹得沸沸扬扬。最终，水牢的存在被证实是子虚乌有，所谓的“水牢”不过是刘文彩存放鸦片的仓库。于是，在1988年，地下室的水被抽干了，铁笼被搬走了，有关水牢的一切印记一下子消失得干干净净。如今地下室门口的一块木牌上，只写着四个大字：“鸦片烟室”。

只是当年刘文彩水牢的始作俑者迄今没有一人表示忏悔，也许，在沉默中他们也在思索：自己究竟被谁给骗了呢？！

（转载于互联网百度搜索，行者悟空新浪博客。）

中国人在这样社会中生活几十年，特别是成长在这个时期的青少年，不断受到弄虚作假、说假话的培育、熏陶、灌注、鼓励。为跟上形势，他们也通过演练，逐渐掌握、不断提高，成为习惯。无形中全社会变成了培养弄虚作假、讲假话的大学校。这个学校与林彪提出的要把全国建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学校一样并存，是无形的。无形胜于有形，身教重于言教，人们心灵上留下的不良影响必然根深蒂固。小孩具有天生的模仿性，老人也有天生的传承性，人人都知“适者生存”，坚持真理不怕杀头的毕竟是个别、是少数。因此，酿成了今天的后果。

在此，我也提一下“不怕杀头”的个别人。在大搞阶级斗争政治挂帅的时代，我亲耳听到两件当年认为反动透顶、顽固不化、不可思议的事现常重浮在脑海：一件是，我在南京大学读书期间，1958年“大跃进”时，郭影秋校长在向全校师生作报告时曾说：他在云南任省长时，有一位大学教授听（政治）报告很用心，每次都伏案记笔记。后来发现，他只反复记“胡说八道”4个字，通篇全文都是写“胡说八道”。另一件是，1964年号召突出政治时我在浙大化工系任教，系党总支书记向我们教职工作报告，他说土木系有位教师解放后从不看报纸。这两件事我听后感到了不可思议，觉得他们是怪人，顽固不化，抗拒改造，思想反动等。现或许不能这样简单地看待他们了。

也在1964年，当时国家大张旗鼓宣传学雷锋，浙大有位博学多才的教授同我说，他怀疑是否有雷锋这个人。我想不至于此吧！但凭他的才智不会胡思乱想。我记得小学语文课中有篇《狼来了》的故事。有个牧羊小孩第一次、第二次喊“狼来了！狼来了！”，人们跑来救助，但没有狼来。救助的人空手回去。他第三次又喊“狼来了”，狼真的来了，没有人来帮他救了，他放的羊一只一只被狼吃了。这位教授也许是受“狼来了”的启发吧！

但有人认为造成现今我国社会道德败落是改革开放引进市场经济的结果。改革开放，实行多种经济所有制并存，改掉过去束缚人们积极性的条条框框，经济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这是有目共睹的。与各国频繁各往，适应世界潮流，融入国际社会，吸取外国所长，科技上取得进步，外贸迅速增长，经济上互补，国际地位提高，这也是公认的。我几次去美国探亲，曾到过美国一些城市，至少没有看到上述提到的小广告和防盗窗。我住在旧金山郊区“硅谷”，路上碰到一些陌生的美国人常向我问好；商场中说话都很轻声，为的是避免打扰别人；我们放在门口（户外）的皮鞋个把月还未明显见

有灰尘：美国人很讲诚信，且根据你以往的表现给你一定的诚信级别，有次我女婿买了约值人民币 100 万元的轿车，根据他的诚信级别，只付 5 万就可把车开回来。去美国签证若逾期返回，下次就很难迁出，我女儿的母亲因照顾她分娩，逾期 3 个月回来，第二次就签不出；我第一次去美国探亲，美国海关准许我在美国逗留半年，我提前回国；第二次去美签证时，看了一下护照后，只谈了几句话就获准，我同样提前回国；现我准备今年下半年第三次去美国探亲，5 月 7 日去上海美国领事馆签证，签证官看了我护照后，只谈了两句话就获准。我知去过国外的其他人一般都说，他们的社会比我们和谐，人际交往比我们诚信。这些都说明我国社会道德下滑不是来自开放的国策。

市场经济的基础是诚信，按法规办事。如社会诚信缺失，规则、法律常被人为扭曲，市场经济就混乱，欺许多，犯罪率高。这也可证实我国目前纠纷多、诉讼多、犯罪率高是由于社会道德下滑诚信缺失不适应市场经济、没有达到市场经济要求的结果。不是后者引起前者。至今还有些国家不承认我国是市场经济国家，这方面的因素也可能其中之一。

按照经典的马克思学说，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都有其相应维护该所有制的社会组织（政党）。成功的市场经济国家都是多元社会。社会多元化权力才能有效地约束，才能有效地制衡（监督），才能有较充分的民主（民主选举、言论自由）。道理很简单，如果执政党不反腐、不清廉，就有被边缘化、被淘汰的可能，生存就受到威胁，因此他就要反腐。要反腐、必须自己做到清廉。韩国前总统朴正熙是铁腕反腐人物，他之所以能这样，与反对党议员在国会敢指着鼻子责问他、选举时专门找他的腐败问题有关，他之所以几次竞选总统获胜，是因为人们找不到他的任何腐败。因此反对党的监督，也是对朴正熙铁腕反腐的支持。没有反对党的压力，反腐就难以常态化、难以坚决彻底。蒋介石、蒋经国为了生存，在台湾时也搞反腐。蒋经国的意志胜于朴正熙，作风清廉，生活简朴。他居住在规模很小的二层小楼，晚年到去世都睡在卧室只有十几平方米的一张与医院病床大小的单人床。蒋介石活着的时候他就负责反腐，他只要听说某个官员有一点儿不好的口碑，这个官员就别想再升迁。他利用这样的铁腕手段，维持了政府机构的廉洁和效率。

这些因素也是市场经济成功所必需的。因此，现对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点是党的领导”来讲，要建好市场经济确是个新课题，也是新难题。我们在总结“文革”教训时，常提到权力过于集中、监督不力是导致“文革”发生的主要根源。这个教训应该认真吸取。但这种现象至今还没